

三) 创造传奇 - 1967-1994

皇家香港警队在处理一九六零年代的种种困难方面，成就足以自豪。但是，香港社会和警队这个主要执法机构都面对重大的问题。这些问题很多可以直接追溯到香港突飞猛进的发展过程，在短短时间里人口和经济力量都有惊人增长。在一九三零年代，香港是一个相当暮气沉沉的港口，可以说是寂静的和殖民地式的穷乡僻壤，就经济和重要性而言，远远落后于上海。战争使贸易停顿不前。随后共产党在中国内战取得胜利、韩国发生战争和接着联合国对中国采取制裁行动，实质上使一切商业活动消声匿迹。香港满街都是渴望找到工作的难民，也有从大陆北方乘船到达的精明工业家；船舱里载满纺织机器，这些机器为香港编织了另一种财富。在这个变化迅速、捉摸不定的环境下，警队努力设法应付巨大的改变。

虽然有了显著的改变，警员的薪酬仍然偏低。他们的待遇较商界人士，甚至其他公务员都要低。管理方面出现了严重不足的问题。警队日常的指挥工作大多在高级警长掌握之中，他们是年资较长的非宪委人员，处事方式比较严厉。曾在非洲长时间服务的薛畿辅处长，为人果断，虽然反对将高级警长的权力削弱的声音相当大，还是下了决心推行改革。警队和香港社会都有贪污存在，这是远近都知的事实，但从来没有人正式承认。贪污主要是由于工资太低而引起，也有人觉得从赌博或其他非法活动得来的金钱可用以支付基层社会的线人，因为他们所提供的资料在遏止罪案方面贡献尤大，从而使人认为最低限度小规模贪污是可以容忍的。

薛畿辅处长更改警务人员的职级结构，以打击贪污。最基本的改变是由大批年轻的非宪委人员担任警署警长的新职级，从高级警长(当时被称为「老虎」)的手中取回行动工作和职位调派的直接控制。此外，经过一次全面检讨后，薪酬方面也普遍提高。但是，打击贪污的最大动力可说来得偶然，当时一间加拿大银行就一个名为彼德葛柏的个人帐户进行例行查询，薛畿辅处长听取事件报告后，非常驚訝一名总警司如何累积这么多金钱？他立即展开调查找出事实真相，调查结果震惊了警队和整个香港。

彼德葛柏是一九六七年事件中的英雄之一，曾经在街头与骚乱者对抗。但当薛畿辅处长于一九七三年六月质询葛柏，并提出葛柏的秘密财产证据时，葛柏晕倒了。这件事极为轰动，也带来影响深远的后果。葛柏逃离香港，使民情汹涌，抗议之声不绝，并直接促使成立了一个

新的执法机构，就是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拥有调查和拘捕方面的广泛权力。这个公署专责对付贪污，所招聘的人员来自本地和海外，并且坚定地展开工作。

毫无疑问，警务人员成为主要的对象，因为警员尤其是军装警员，在日常工作中与市民有最密切的联系。打击贪污的行动既无处不达，也认真严厉，不少人因此被捕。在警队和社会里，很多人觉得事情做得太过火，他们认为多年已为人接受的做法，或者当局已熟视无睹的做法，现在却受到仔细调查和检控。

一九七七年，数以千计的警务人员相信自己成为新制度的受害者，列队游行往警察总部或举行聚会，抒发他们的忿怒和苦恼。政府考虑到原意好的事也可能做得过了火，于是就过去几乎所有个案发出特赦令，当中大部分祇涉轻微贪污事件。

扑灭贪污运动也留下了深刻和刺痛的伤痕。在汲取经验后，社会里有一个新的感觉出现。许多年轻的警务人员知道以往必须接受礼物和贿款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反而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一个由三名英国高级警官组成的委员会研究警务处的人手和结构后，提出很多建议。全部建议均获当局接纳，其中最重要的建议是警务人员应该有可以维持生活的工资。在这为期五年的变动之后，警务处的制度变得有更佳的人员、管理上更直接和开诚布公，也就是当日可以见到的皇家香港警队。

在那些困难、令人苦恼的日子里，警务人员在执行任务时从未犹豫不决。一九七二年所发生的山泥倾泻、年复一年的台风吹袭、罪案浪潮和天灾都由富有信心和经验按年增强的警务人员恰当处理。虽然调查工作进行，关于过往贪污问题的广泛宣传和士气方面的短暂低落，警务人员继续全心全意为市民服务。

警队继续得到市民大众的广泛认同和信赖。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以来，当局成立了一个公共关系 / 资讯的部门，目的是告诉市民警务处的工作。在香港历史里最大的青少年组织 - 「少年警讯」，招募了青少年协助扑灭罪行，成绩有目共睹。警务人员的招募数字保持在高位；在香港警务处工作是令人向往的；从警察训练学校毕业的青年男女比较上几代的人，教育水平更佳、更具自动自觉精神和获得更良好的薪酬。

另一方面，指挥结构方面也在改变中，在六十年代初期加入警队为见习督察的年青人其后已晋升到高级的职级。他们很多是华人，他们的工作发展和前途自薛畿辅时代以来不断改善，正反映时代的变迁。这些高级本地警务人员接任最高的管理阶层，这是由于在一九九七年后有实际需要由香港华人指挥警队，以履行北京与伦敦所达成的协议规定，也是警队在六十年代开始具前瞻性职业发展模式的成果。一九八九年，李君夏成为首位华人警务处处长，许淇安于一九九四年继任。

在一九七零及八零年代，越南船民不断涌入香港。一九七九年，船民人数超过七万人，其中超过 7,000 人乘坐三艘船到港。政府为安置这些船民及处理相关的治安问题，即时盖搭临时收容所，并派遣警员驻守，这大大加重警队负担。其后的十年，随着更多的收容所落成及启用，问题才得以改善。然而，滞港船民数目仍然有增无减；他们当中祇有极少数真正难民。而营内的骚乱，尤其九十年代初的大型骚乱，为警队带来巨大挑战。直到一九九零年代中期，警队展开大规模遣返行动，以飞机遣送船民回越南，问题才得以逐步解决。

一九八零年代初期，警队在架构和组织上进行重大改革，目的是提高总区、警区和分区三个层面的指挥能力；整体原则是希望将权力和责任下放至最低及实际可行的指挥层面。其后，警队又全面检讨军装部人员的调配事宜，其中包括修改小队的指挥架构、改善维持社区治安的方法和实施较灵活的巡逻及轮更制度。

在一九七零至九零年代期间，警队大幅扩展编制(由七十年代中期的 14,500 增至八十年代中期的 24,700 及九十年代中期的 27,500 名人员)，以应对香港人口数字攀升(由七十年代中期的四百五十万人增至八十年代中期的五百五十万人及九十年代中期的六百一十万人)所带来的挑战。上述扩展编制计划为现代化的警队奠下基石，亦有助警队成功应对往后的各种挑战。

在九十年代初，涉及真枪的劫案(特别是针对金铺和钟表店的案件)数目上升。匪徒常常配备大火力枪械，妄顾市民安全在闹市中恣意开枪。虽然警务人员在这种极度危险的环境下面对严峻考验，他们仍坚毅不屈和勇敢地维持治安，并与内地相关执法部门有效协调。全因警队制定有效策略打击暴力罪案及每位警务人员保障市民生命安全和维持社会秩序的决心，持械劫案其后在香港几近绝迹。涉及真枪的劫案在一九九零年多达 66 宗，在一九九一年和九二年亦分别有 46 宗；而在二零零七年至二零一四年期间，并没有这类案件发生。

参考文献：

1.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政府统计处网页，「人口估计」，(有关年份 1961-2015)。
2. 洗乐嘉。《皇家香港警察队一百五十周年纪念 1844-1994》。香港：皇家香港警察队警察公共关系科，1994。